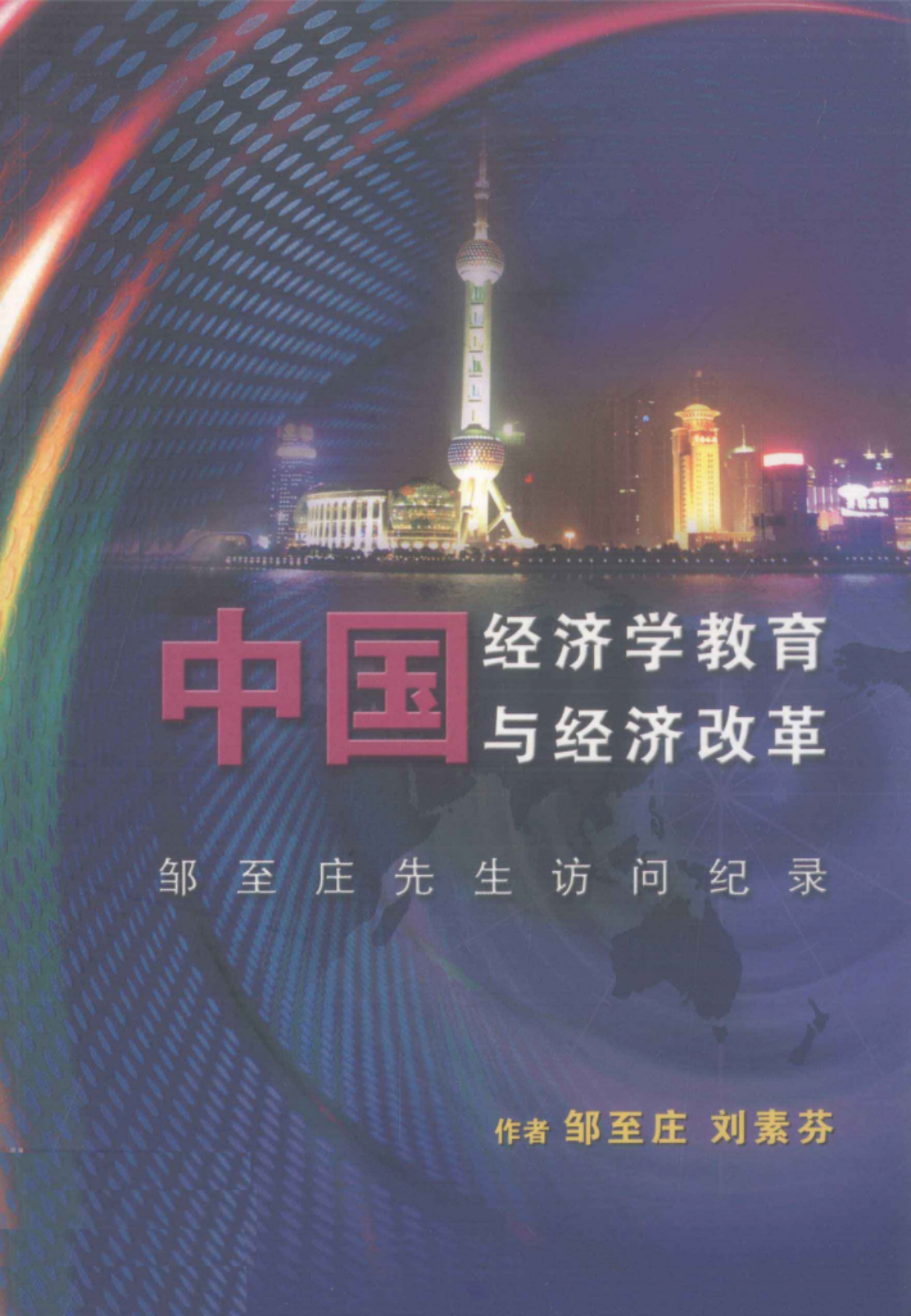




中国 经济学教育与 经济改革

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

作者 邹至庄 刘素芬

本书介绍了现代经济学介绍了现代经济学介绍了现代经济学说：“一个国家能否进步，一个国家能否进步，一个国家能否进步，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推论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人力资本很重要，可是发展人力资本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盖一间房子，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培养人力资本却需要几代人的投入。又如经济学教育，培育一批可用的人才，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接着透过这批人建立一些经济学系，再去训练更多的人才。中国这么大，要训练出足够的人才，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本书也介绍了邹至庄教授在台湾经济政策的制订及中国经济改革的规划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担任过IBM公司、台湾、中国的经济顾问，邹至庄教授说：“有些人擅长研究写论文，但是学术论文写得好的，思考经济政策未必灵活。对市场经济建议灵光的人，也未必是论文写得最好的人，这两种天赋不同。”他正是这么一位兼具学术研究与经济决策两种长才的难得学者。



中国 经济学教育 与经济改革

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

作者 邹至庄 刘素芬

中国

经济学教育
与经济改革

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作 者 | 邹至庄 刘素芬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张慧梅 冯婉明 |
| 封面设计 | 何秀云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八方文化创作室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联 络 | 65-64665775 支线258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 初 版 | 2007年11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139-78-6(pbk) |
| 版权所有 | ©2007 八方文化创作室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vii

我很感谢刘素芬、樊沁萍两位教授愿意访问我和花了不少工夫记录整理。对我个人而言，趁此机会把我一生至今她们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事情回忆一下，以之反省，对日后的生活及工作必有裨益。有些事情或想法，读者或许感兴趣。我说话很直，要说就说，想了就说，若有些地方对别人不客气，还请他们原谅。

访问从1996年6月27日至7月6日，共十二次。正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在南港中研院举行，同时我也是经济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与该所同仁常谈论研究问题。在此十天除参加会议各种节目及研讨之外，没有太多时间接受访问，所以很多纪录不够详细。包括早年在台湾，近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在美国研究与教学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可以加一倍以上的篇幅来详述，只能留待日后想起来再补充。

在学术界，每位同仁写一本书或一篇专题论文，都有故事可说。A. Pagan教授访问了我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经过，刊登在1995年

的《计量经济理论》(Econometric Theory)第597至624页,可供读者参考。又如我因为主持并参加动态经济与控制学会年会,在七〇年代后期与八〇年代初期常到欧洲各国进行学术活动;许多在美国经济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趣事;在学术上,许多朋友、师长、学生对我的影响等。以上都没有包括在纪录内,也很难用简短的篇幅补充。

刘、樊两位教授又以书面方式问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估与看法,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选择的得奖者从1960年开始大致都很有水平,选得不错。有些是大家一致公认对经济学有很大贡献的,如Arrow、Friedman、Samuelson、Tinbergen等。但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得奖者,大家(指世界第一流经济学系的教授,或某些重要经济学会的全体会员,或包括曾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者)不一定同意。虽然没有太不够水平的,但亦不乏众人认为相当平凡的。得奖是一种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这么重要。经济学界是相当有判断能力的,一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一般同行都认识,对他或她的贡献都有评价,不用诺贝尔委员会去评断。换言之,如果经济学界承认你的贡献,不需要诺贝尔委员会来肯定;如果经济学界不承认你有重要的贡献,他们不愿意读你的作品,连研究生也不读,对学术研究没有影响,就是得了诺贝尔奖,也都没有大作用。充其量只有一天的报载,数日后大家都忘记了。试问经济学研究生,他们能记得多少位经济学的诺贝尔得奖者?大致想不出六位,更不用说一般不专攻经济学的知识份子了。

上周1996年的经济学奖公布了,其中之一系William Vickrey,我觉得选得好,虽然事前我没有猜到他,因为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资格。但选出之后,我是同意的。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已退休的教

授，六〇年代我当该校兼任教授时，他是系主任。他在上星期二（10月8日）得奖，我十分高兴。次日，星期三，我去上博士生二年级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time series）的课，共有十九位学生。我问：「有谁听过Vickrey教授？请举手！」只有三位学生举手。获奖者的知名度由此可见。数年前计量经济学前辈Trygve Haavelmo得奖，我也曾问选修计量课程的二年级博士生十数人，只有两人举手说认识他。Vickrey教授的际遇令人既喜又悲，得奖三日后的星期五，他在晚上十一时许独自开车外出，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医生说在这三日内忙于接电话、接受记者访问等事，过于操劳，可能影响心脏的运作，以致有此悲剧。

我今早（1996年10月16日）在普林斯顿家里写序，因为要回答访问人的书面问题，而刚巧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在上周揭晓，所以顺道在这里一并叙述，或不免有些突兀。如果是当面访问，我会说下面关于Vickrey教授的一些掌故。数年前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此之前我已当选为该会理事（Council member，共有六位，三年一任，一年选出两位）。有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理事会会议，当然由会长主持，订于3月份的某一天上午八时半或九时在一所饭店开会。理事同仁都投宿该旅馆，唯有主席从纽约乘半夜开的火车，早晨七点多钟到华盛顿来开会。在火车上睡觉当然没有旅馆舒服，而且要等到半夜才能上车，很早就要起来准备下车，为的是节省一晚的住宿费（按该旅馆因为欢迎年底经济学会会员订房，数目多达数百或上千的房间，所以优待理事们免费住宿）。这还不算，下午散会后，会长和我同去火车站搭车，普城是从华府到纽约必经之路。他不肯花五美元的计程车费，一定要走十分钟的路到地下铁车站，再花一美元乘地下铁去火车站。我只得陪着去。到火车站后，我看见四十分钟后有一班车要

开，当然想搭这班车。先生却不肯，说要坐等（不坐在舒服的餐厅而坐在公用的硬椅上）两个多小时后的晚车，省下十八美元左右！我实在不能再奉陪了。Vickrey先生惯于节省的程度有如此者。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系设计在不同时间收不同的路费。他的主张在美国应用不广，但在星加坡市中心的汽车交通费上实行了。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在下午下班时间收费比晚上高，因此他可能是个实行自己交通收费理论的消费者。上周我知道他电话忙，所以想过几天再恭喜他得奖，不料却已失去机会，现在只能缅怀他的旧事。

我今年足六十五岁，要做的事还很多。现在正是美国总统竞选最热闹的时候，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生于1923年7月，现年七十三岁，比我长七年多，他正在寻求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可知我离此刻还远，需要继续累积经验和学识，才有资格做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如有进展，日后将向大家交待，谢谢读者的关注，并请指教。

1996年10月16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二〇〇七年

再版序

自从1996年《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出版以后，我继续致力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的工作，在此向读者报告，书名也因此由《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改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还请读者指教。

再次感谢刘素芬教授愿意访问我和花了不少工夫记录整理。刘教授的观点是「深入研究台湾经验，进而传递到海峡对岸，乃至东南亚以及其他开发中国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她又说：「先生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从而具体说明台湾做为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对于人类文化和广义的国际交流合作可能具有的价值与贡献。当然，我们深知要达到此一结论，仍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在先生的访问纪

录基础之上，我们的步履将更加踏实与坚定。」虽然我很佩服刘教授的理想，的确台湾经验是我在1980年回到中国大陆之前累积的重要经验之一，此外还包括我对经济学的学习，以及在IBM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的顾问等经历。1980年以后我开始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其中也不乏可供现在的台湾学习之处，从本书第二版的新内容可以发现这些例证。

有些中国朋友问我为何不找一位国内学者替我写传？其中一个理由是很难找到有像刘教授水平的人合作；另一个理由是本书的部分内容恐怕不容易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使在国外出版以后，能否进口中国大陆，可能也有问题。

2007年5月16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前言

1994年秋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时值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哈佛人文荟萃，许多海内、外中国人汇聚一地，每为此展开激辩，然而终难有所定论。在繁忙的课业与研究之余，两岸关系问题成为我最沉重的负担。

在此背景之下，有幸旁听哈大历史系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毋宁是自然而又顺理成章的选择。入江教授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巨擘，他最重要的学术论点是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研究取向之外，另辟蹊径提倡文化研究取向，强调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他的主张恰能为两岸轳轳的政治、经济问题，提供另一类思考的空间。

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社会各界掀起中国热，在学术界亦历久不衰，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哈大自不例外。相形之下，

有关台湾的研究可说凤毛麟角。除了经济发展课上偶一提及之外，唯有人类学系张光直（K. C. Chang）教授开有「台湾研究」课程。张教授认为尽管没有外国学生选修，显见台湾研究尚未能唤起国际学界的充分注意，但是面对来自海峡两岸的学生，得以英文、中文、台语交互使用，大为提高上课的自由度与乐趣。张教授当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且健康情形日趋恶化，在于公于私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仍愿为台湾研究贡献心力，他的执着与付出，令我深为感动。他认为台湾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堪称学术研究的微实验室，鼓励学生以科际整合的角度研究台湾学。因此，结合入江教授与张教授的说法，我认为将台湾定位为人类文化的实验室，深入研究台湾经验，进而传递到海峡对岸，乃至于东南亚以及其他开发中国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此同时，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在顾应昌院士的建议之下，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决策研究系列」主题研究计划，研究1949年以后的台湾发展经验。其中我与同事樊沁萍博士合作的「美援时期的工业政策」研究计划，正符合前述尝试摸索的新方向。基于此一精神鼓舞，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更能顺利进行。1996年夏初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认为1950年代中美双方的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的互动，在台湾的经济决策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于此一台湾经验的结论，对于其他的社会经济体有何意义，我们尚不敢妄下论断。

1996年6月适逢邹至庄先生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在经济所发表公开演讲，提及他参加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猛然醒悟邹院士本身就是传递台湾经验的鲜活实例，遂引起我们进行此一口述访问的动机。承蒙先生慨然允诺，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访问。在访问进行中，先生的做事效率与精神毅力，令

我们印象深刻。限于时间迫促，访问纪录只能略尽先生生平之一二，但已足以说明借着欧美现代经济学的媒介，先生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从而具体说明台湾做为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对于人类文化和广义的国际交流合作可能具有的价值与贡献。当然，我们深知要达到此一结论，仍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在先生的访问纪录基础之上，我们的步履将更加踏实与坚定。

我们感谢邹至庄院士接受口述访问，并细心审阅初稿。我们也感谢钟杏珠小姐不憚辛劳帮忙记录、输入电脑及校对的工作。承蒙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补助经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小组召集人张力先生和曾金兰小姐提供协助；以及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答应出版本书，在此一并致谢。谨以此书献给为人类未来与和平努力不懈的伟大心灵。

刘素芬 谨识
1996年秋于台北南港

前言二

XVII

2006年4月接获邹至庄先生来函告知，有意修订十年前出版的口述访问，我欣然从命。因为在过去十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已经有了非常可观的成果。先生身为一个播种的园丁，一方面感受到收成的喜悦，另一方面也关切未来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以上均在此一十年回顾中充分表露无遗，既创造历史，也见证历史的发展，先生可谓当之无愧。

更重要的是，先生凭着敏锐的观察与犀利的专业判断，使他得以见人之所未见、勇于言人之所未敢言。这些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的诤言谏论，未必尽是人所未见，却往往是人所未敢言。先生的杰出成就，与其说是所谓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风骨或理想，毋宁说是时势造英雄。其中一部份原因固然可以归之于先生的人格特质，可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制有关。

「我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在追求个人自利的同时，也达成社会利

益。」经济学的陶冶和训练，既是先生立身处世的信念与原则，也造就先生成为一个跨国界的专业人士。当年轻资浅的归国学者，徘徊在泛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之下，对于个人的行止进退无所适从，更忧虑学术专业的落后，诚如先生所说：「学术成就必须通过市场考验。」「经济学的就业市场有了国际竞争，也是一件好事。」无疑给年轻人指出了一条明路。

先生是世界知名的计量经济学家，1960年即以Chow Test的成名著作称于世，时年三十岁。其后担任台湾和中国的经济顾问，更将计量经济应用到两岸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上，成果斐然。特别是将欧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引进中国，并协助中国教育部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经济，培养人才，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既深且巨。然而在光环的背后，先生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压力很大，一方面同事不承认我做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我教书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我是计量经济学的教授，而非中国经济的教授。我有时候觉得研究中国经济是牺牲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研究。」充分反应出知识份子的良心挣扎与学术市场竞争的铁律，并无资深、资浅的差别。

先生自言深受童年教育的影响，也认为人才培养不限于学校教育，肯定家庭、社会、文化对于人力资本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先生说：「这是中国的传统，非常注重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从自己家里做起。长年担任普大国际中心主任的邹夫人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中国文化、台湾文化，还有中南美洲的拉丁文化。我们相处得很好，十分融洽。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家庭很普遍。」可见家庭是传递文化的基本单位。

身为计量经济学的泰斗，先生对于数字的敏感可说是一种天赋，对于精确的追求也就成了一种执着。在整理口述访问稿的过程之中，先生字斟句酌，甚至连接词、形容词、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也让共同参与工作的我得到最好的学习，深深体会到学术求真的精神，在经济学与历史学并无分轩輊。单就这一点而言，我相信先生的口述访问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一页。

刘素芬 谨识

2007年5月于台北南港

... X1X ...